

人文大師下午茶·蕭高彥院士 「乘著思想的翅膀」

時 間：114 年 10 月 1 日（三）14:00-16:30

地 點：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 7 樓第 1 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科會人社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主 講 人：蕭高彥（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致 詞 人：林瑋嬪（國科會人社中心主任、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特聘教授）

主 持 人：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人文處政治學門召集人）

與 談 人：柯政佑（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黃嘉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趙翊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劉佳昊（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鄭泱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記 錄：童泰瑛（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並由蕭高彥院士增補審訂。



圖一：蕭高彥院士（右四）、林瑋嬪主任（右三）、冷則剛研究員（左四）與青年學者合影

從事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何種基本功？又該如何培養？本次人文大師下午茶由中央研究院蕭高彥院士擔任主講人，以自身過去數十載的學思歷程為例，為有意投入其中的年輕學子，以及正提筆耕耘的學術後進，解明以「思想的翅膀」翱翔於政治思想史領域所不可或缺的涵養、心態與技藝。蕭院士不僅在研究上成果豐碩，亦長期致力於學術服務，在理論與實務兩方面，皆有豐富且深厚的經歷與心得。本次活動分兩部分：首先由蕭院士進行演講，分享其自大學時期投入政治思想領域以來，一路上的學術與生命歷程，以及這些經驗與所思如何裨益其研究；之後，由與談人進行提問，以深化大師與青年學者之間的思想傳承。

一、政治思想的分野：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

本次活動的主題聚焦在蕭院士的學思歷程與治學態度，演講開頭，他並不急著直接切入自己過往的求學過程，而是先從他如何理解政治思想談起，為聽眾勾勒其大致輪廓。值得一提的是，蕭院士並非以談論概念定義的方式，描繪政治思想此一學門的研究旨趣，而是以一個思想史學者的身分，帶領聽眾從古希臘出發，穿越啟蒙運動，一路直到當代該領域的發展，由此引出一個重要的主題：在政治思想領域中，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史二者有何不同？這種「布局」有助於後進更能領會，何以鑽研政治思想史研究會需要技藝與心態。

蕭院士先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其《政治學》中表達的人性觀談起：人是政治的動物。但在此時，亞氏所欲強調的並非後來霍布斯（Thomas Hobbes）式的主題，即「人類之間無可避免會相互衝突與鬥爭」，而是「只有人會運用語言、分辨善惡」；因此，「正義與不正義」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進入了人類的實踐生活中，而系統性的思想也成為人類的專屬特徵。然而，柏拉圖（Plato）也提出，人由受制於自身經驗、觀察、想像而得出的意見（*opinion*），終究不同於真理，而人必須致力於使自己脫離前者的狀態，達到後者的境界。如此，理性（*reason*）的重要性便彰顯出來。

然而，理性的內涵究竟為何？蕭院士基於霍布斯的分析觀點回答這個問題。人類理性蘊含三個要素：慎思（*deliberation*）、判斷（*judgement*），與抉擇（*choice*）。小從食衣住行，大到人生目標，人都離不開理性的這三個環節對其行動的意志指引。如此，人類基於這三個要素累積經驗，就會對政治價值逐漸發展出論述（*discourse*），或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談的「思想系統」（*system of thought*），也就是將思想內容中的概念範疇，以一種有秩序的方式加以編排，

用以表達人對其社會、政治現象，乃至歷史發展的理解。到了法國大革命前後，當時的西方人開始主張，政治行動的綱領應當從人類的有組織之價值思想中推導得出。如此，便產生各種現代的「意識形態」(ideology)，諸如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在簡要說明現代政治思想的各種樣態後，蕭院士指出，面對政治價值，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徑；而釐清二者之間的差異，對有志於投入此領域的學生格外重要：究竟是要從「哲學式」的角度，還是從「歷史式」的視野，切入政治思想與價值？蕭院士認為，這是當學者決定投身此領域時，一個首要必須仔細考慮的問題。

「哲學式」的政治思想，或是政治哲學，其旨趣在於透過理性思辨，建構(construct)、證成(justify)組織社會的基本政治原則。當代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他以康德式思維出發，嘗試建構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組織原則，也就是其著名的「正義兩原則」。在他看來，人類普遍所具有的理性或「合理性」，在一種接近社會契約論的「無知之幕」之後，將會引導人們選擇他所建構並證成的正義原則來安排所處的社會。對羅爾斯來說，正義兩原則至少能普遍地適用在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

與這種「哲學式」的取徑相對的，便是蕭院士長年耕耘於其中的「歷史式」取徑，也就是政治思想史。受到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史學方法論的影響，「歷史的態度」並不試圖追求一個具有普世性乃至超越性的政治原則，而是將焦點置於在歷史過程中各種政治價值的出現、脈絡、語言概念之型態，以及歷史流變。這一歷史式的取徑並不預設其研究對象具有普遍的適用性，而是強調政治論述不可避免地會有某些意識形態的性質，因為這是任何嘗試證成政治正當性(legitimacy)的論述所無法避免的。

為何在以上兩種取徑之間，蕭院士選擇了思想史作為終身志業，而非政治哲學呢？這就關乎於其求學經歷與治學態度了。

二、學思歷程與治學態度

一九八〇年，也是臺灣即將離開威權主義的最後期，蕭院士進入了國立臺灣大學就讀。起初，他並非政治系，而是當時商學系工商管理組的學生。他對政治思想的興趣一開始也不是經由課堂，而是在當時三民主義研究社的學長所帶領的讀書會之中萌生的。那個年代的臺大校園洋溢著對社會學與政治學理論的興趣，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對韋伯(Max Weber)思想的

熱切關注，已經到達可稱之為「韋伯熱」的地步。蕭院士在當年也深受盧卡奇（György Lukács）的《歷史與階級意識》與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讀資本論》所影響。在此般學術風氣下僅過了一年，蕭院士便決定從商學院轉入了政治系政論組，正式接受政治思想方面的專業教育。然而，當年想要取得一些有禁忌的思想家文本也並非易事，許多文獻都在「匪情資料」的名義下被限制閱覽，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如《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自然也位列其中。有趣的是，當年在臺大圖書館唯一典藏的馬克思青年著作英譯本藏身於經濟系圖，有興趣的同學會口耳相傳借出研讀。在這樣處處受限的環境下，決意投身於政治思想的學術研究所必須的興趣之強烈，絕非三言兩語可說盡。蕭院士直言，以思想為研究對象，要求學者以熾烈的興趣或堅定的現實關懷作為燃料，否則最好另尋他途。

除了學術興趣外，研究能力的培養亦是不可或缺。蕭院士表明，在轉入政治系後，影響他最深的課堂便是後來的大法官吳庚教授所開設的「現代政治思想」課程。吳庚教授長年沉浸於費希特、韋伯、施密特等思想家的研究中。正是這些著作與吳老師的課堂，引導了當年的蕭院士立志要以政治思想為未來探究的方向，並選擇了作為馬克思與法蘭克福學派思想之源頭的黑格爾為起點。於是，大學畢業後服兵役期間，蕭院士於軍中熟讀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與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回到臺大碩士班後也請吳老師指導，並在兩年後完成碩士論文，於一九八八年進入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班深造，研究黑格爾的政治哲學，指導教授是近年亦有新作推出的 Steven B. Smith 教授。

蕭院士接著回顧他一九九三年回國後研究歷程的發展，特別強調配合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的重要性。然而，研究能力的精進仍須循序漸進，無法一蹴而成，所以應該從一年期的計畫開始，當經驗累積充足後，就可規劃比較大型並具系統性的研究主題，提出多年期計畫。蕭院士回憶他剛回國時的研究主題，是陸續探討與黑格爾思想關聯度較高的當代政治理論家，如泰勒（Charles Taylor），麥金泰爾（Alasdair McIntyre），桑德爾（Michael Sandel）等。

經過五、六年，蕭院士在研究馬基維利的政治思想時，深入當代文獻，特別是劍橋學派的解釋觀點，與傳統的馬基維利傳統解釋觀有重大差異，遂投身於西方共和主義的研究，陸續往上溯源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往下研究盧梭、美國立憲時期的《聯邦論》、法國大革命的制憲權理論，以及當代的鄂蘭等共和思想，於二〇一三年將研究成果出版了專書《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可以算是回國後第二階段的研究。

而蕭院士下一階段的研究，也與國科會計畫有關。他在二〇一三年申請到「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為期五年，可以有充裕的時間進行專書的構想與寫作。而他的分析觸角也從西方現代政治思想對主權國家、民主政治，與商業社會的分析，跨足到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特別是嚴復在他的譯書以及政論中，如何運用並轉化西方的政治概念進入中國的論述場域，產生深遠影響。這些研究成果，也在二〇二〇年刊行為《探索政治現代性：從馬基維利到嚴復》學術專書。

近年來，則關注國際政治思想史的議題，正在撰寫關於自然法與古典萬民法的形成，以及十九世紀歐洲國際法體系的形成與崩解，乃至兩次世界大戰以後新的國際政治理論之發展的專書。

基於以上的學思歷程，蕭院士也與新進學者分享其研究經驗。除了前述積極運用國科會計畫的資源外，蕭院士認為在起步階段，無論是政治哲學或政治思想史取向的年輕學者，都應該選擇至少兩個大的理論系統，深入研究。因為單一的思想系統容易過分主導研究者的視野；唯有同時深入性質不同甚至相對立的體系（以政治思想史而言，如霍布斯與盧梭；以政治哲學而言，如羅爾斯與施密特或鄂蘭），才能在悠遊涵泳之餘，提升自己的分析、思考與批判能力。

至於治學的方法，蕭院士強調應先精讀原典，以「於不疑處有疑」的態度仔細探究經典文本的義理。蕭院士自承，受到早期研究黑格爾思想的影響，基本上會先預設經典文本有其系統性的義理，可以經過仔細的閱讀加以重構，這也是研究的終極目的。從「無知」、「懷疑」，經過「困思竭慮」，到「豁然開朗」，是研究必經的歷程。然而，他也指出，當代社會科學深受美國以期刊論文為主的生態所影響，所以寫作時絕對不能忽略近年來主要期刊對於所分析主題已經建立的學術成果，必須以此基礎建立自身的研究成果。

蕭院士用相當生動的例子加以說明。他年輕時發表在一流期刊的英文論文，討論黑格爾的官僚理論。對這個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主題，他運用了後來韋伯所提出的科層制社會學理論加以對比，並銜接到當代公共行政理論。他事後來看，這是一篇「跨學科」或「科技整合」的論文，其理論涵義不限於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能在主流的期刊發表。相對地，蕭院士近年來的研究在經典文本與二手文獻的採擇方面，則有更大的餘裕自我發揮。他用音樂演奏來比擬他現在的政治思想研究態度：經典文本好比樂譜，歷來重要的詮釋觀點是之前的演奏，在兩者都爛熟於心的狀態下，提出其個人系統性的詮釋與義理分析（自己的演出）。

所以，對於一個常被提起的問題：「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學與現實政治有什麼關係？」蕭院士指出，假如是政治科學的信仰者，他們會認為所學的理论可以「應用」到現實中；而傳統的政治思想研究者，通常會回應以一種較為迂迴的說法：政治思想或哲學具有陶養的功能，在深入研究之後，可以產生實踐智慧（prudence），讓行動者產生一種默示知識（tacit knowledge），能夠面對變化萬端的形勢。然而，現代的社會分工以及學術的專業化，已經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知識。蕭院士以劍橋學派史家史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觀點指出，他並無懼於故紙考證（scholarly antiquarianism）之譏，因為人常常囿於當下習見輿論所成的狹隘視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只要問題意識明確有據，可以探索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經過系譜學的重構，反而可能產生重要的當代涵義，提供反思資源，開拓政治視野。

三、提問與回應摘要

提問：請問年輕學者如何在當今快節奏的學術生產環境中，應如何調適？若暫時缺乏靈感時該怎麼辦，如何能突破寫作的瓶頸呢？

學術研究與他種工作最不同的地方在於，研究者離開研究室之後，關於研究主題的問題往往依然在其腦中盤旋：研究者無法隨著場所的切換，乾淨利落地中斷其思緒，因此學術工作為研究者帶來的壓力，可說是相當沉重。因此，有理想去追求固然是好事一件，但應在生活中培養一些嗜好，有壓力時要記得先退一步，轉換注意力，讀讀其他書籍，等身心狀況恢復活力後再接再厲。老子曾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這是陰陽兩面，我們在學術研究之餘，也不能忽略人生幸福的其他面向。

提問：政治思想中的「哲學的取徑」與「歷史的取徑」如何良善的互動，以深化彼此的連結而非日漸疏離？

在西方思想的發展過程中有三個重要的革命影響歷史意識。首先是康德的道德與權利哲學，其次是邊沁的效益主義，最後則是現代的經濟學。這三種體系強調純理性或科學原則，使得之前思想的複雜歷史性容易遭到忽略。然而，這也反應政治理論會受到時代主導的思潮所影響。好在目前歷史取向的政治思想研究也欣欣向榮，所以蕭院士主張各種研究取徑可以並存，各自努力。

提問：對於「在兩個不同但有共通基礎的思想之間，尋找一個連貫的體系或學術脈絡，以增進對前兩者的理解」這樣的政治思想研究，有沒有什麼原則或經驗可供參照？

這種思想體系之間的對比問題在政治思想研究中並不少見。兩個思想家之間，如果無法共量或不需共量，則學者通常不做這種研究（硬做也難免流於比附）；而若有可能共量，那找出這兩者所共享的思想資源就會是一場硬仗。學者必須自己找出一個可將二者結合在同一層次上的分析方法，這可能會使其理解偏向某一邊，也有可能產生綜合性的觀點，這是研究者自己要去權衡的問題，沒有一個不變的法則可循。前面所說選擇兩個大的理論系統並深入研究，主要目的正在於此種能力的培養。